

# 论类书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流传

刘全波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类书是一种知识性的资料汇编, 广泛流传于东亚汉字文化圈, 且广为士大夫、读书人所接受与喜爱。中国类书历史悠久, 卷帙浩瀚, 以官修类书为主流, 文学类书、科举类书、日用类书等私纂类书则是支流; 日本、朝鲜、越南类书深受中国类书的影响, 流传中又被加入了日本、朝鲜、越南特色。类书的流传遍及了从“西域”到“东海”的广大区域, 成为东亚汉籍中不可或缺、不容小觑的一支。

**关键词:** 类书 东亚 汉字文化圈 流传

**中图分类号:** Z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11) 04-0118-08

类书是古籍中辑录各种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 按照一定的方法加以编排, 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资料汇编。据赵含坤先生《中国类书》统计, 中国古代所编纂的类书达 1600 余种 (包括存疑的 125 种)。<sup>①</sup>陈垣先生做过《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 其中类书类的总页数为 227739 页, 占整个《四库全书》总页数的 9.94%, 占四库子部所有图书总页数的 40.35%。<sup>②</sup>类书类的总页数在整个《四库全书》44 子类中占了近十分之一, 而在四库子部中竟然超过了五分之二, 足见类书数量之巨大, 卷帙之浩繁! 张伯伟先生曾言“事实上, 在二十世纪以前, 汉字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 一切正规的著述, 一切重大的场合, 一切政府与民间的外交, 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sup>③</sup>诚然, 古代中国作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宗主国, 不仅创造了汉字, 更编纂出大量的珍贵典籍, 而这些典籍又随着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 在亚欧大陆的东部广泛流传, 塑造出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汉字文化圈, 而类书就是这流传着的众多典籍中的十分重要的一支。

收稿日期: 2010-10-25

基金项目: 2010 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敦煌写本类书《篇金》研究”(10LZUJBWZD004)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魏晋南北朝类书研究”(11YJC870016)。

作者简介: 刘全波 (1984-), 男, 山东阳信人。2009 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类书文献研究。

① 赵含坤《中国类书·凡例》,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②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年, 第 26-34 页。

③ 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1),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年, 第 1 页。

## 一、类书在中国的流传

类书始于《皇览》，历代皆有编纂。从魏晋至明清，中国历代皆有帝王出于国家政治与学术的需要，组织当时的文化精英编纂出一部部卷帙浩繁、资料磅礴的大型类书，每一次大的类书编纂，朝野之文人墨客、硕学鸿儒皆被网罗其中，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类书修纂已成为一个王朝文治兴盛与否的标志。官修类书一直都是中国类书发展的主流，因为只有政府出面才可以组织全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共同编纂出一部部高质量、大部头的鸿篇巨著，但官修类书之外，各种形式的私纂类书同样兴旺繁荣，其中以文学类书、科举类书、日用类书的流传最为广泛。<sup>①</sup>

那些名传千古的大诗人、大词人，很多同时也是类书编纂家，他们诗文创作的源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依赖其编纂的既博又精的类书。白居易之《六帖》、元稹之《类集》、温庭筠之《学海》、晏殊之《类要》、秦观之《精骑集》就是例子，甚者，诗赋体类书一度流传开来，唐皮日休以五言诗体的形式编纂成类书《皮氏鹿门家钞》，北宋吴淑则以赋体事类形式编纂成类书《事类赋》。文学类书之外，为应对科举考试而编纂的各种形式的科举类书更是百花齐放，大行于天下，高承《事物纪原》、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陈傅良《永嘉八面锋》、潘自牧《记纂渊海》、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章如愚《山堂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黄履翁《源流至论》、王应麟《玉海》、佚名《翰苑新书》等不断涌现出来，在士大夫、读书人中间广泛流传。<sup>②</sup> 类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排比详瞻，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典章制度、军事科技、学校礼仪、服食器用、草木鸟兽等皆搜罗裒辑，且以类相从，分门别类，要言不烦，简明扼要，这对于士大夫、读书人积累知识、开阔视野、遣词造句、参加考试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帮助的，士大夫、读书人多将之视若珍宝，藏于巾箱。

日用类书相比较于官修类书、文学类书、科举类书属于类书的“下层”，其主要流传于市民商贾等社会中下层知识人之间，书里面有大量的实用知识和经验总结，甚至还有许多修身齐家、劝人行善的格言锦句收录其中，故日用类书题名多标有“天下”、“四民”、“士民”、“便用”、“利用”、“便观”、“便览”等字眼。《中国日用类书集成》收录、影印了《五车拔锦》、《三台万用正宗》、《万书渊海》、《五车万宝全书》、《万用正宗不求人》、《妙锦万宝全书》六部类书，而这六部可谓是明清以来流传最广泛且最具典型性的日用类书。<sup>③</sup> 酒井忠夫《中国日用类书史研究》又介绍了《居家必备》、《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燕闲秘录》、《酬世锦囊》、《商贾指南》、《士商类要》等日用

① 郑炳林、刘全波《类书与中国文化》，《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第122-126页。

②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6-1153页。

③ 酒井忠夫监修，坂出祥伸、小川阳一编《中国日用类书集成》，东京：汲古书院，2000-2004年。

类书。<sup>①</sup> 日用类书的出现应该是在南宋时代，并毫无疑问的孕育于传统经典类书母体之中，经典类书的使用人群主要是以士大夫、读书人为主，他们利用这些类书或储备文料创作诗词歌赋，或渔猎经史子集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庶民阶层识字的人增多了，农牧商贾对于知识、文化的需求开始增加，于是日用类书遂成为一个潮流并在民众间迅速流传开来。

在地域上，类书的流传也是十分广阔的，无论是繁华的近畿都会，抑或是边远的村野山林，可以说凡有诗书之处，皆可见类书的流传。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就有不少魏晋至唐宋间的类书文献。据王三庆先生统计，敦煌写卷中的类书或部分接近类书的书抄，凡113个卷号，可归纳为6体43种，有《修文殿御览》、《励忠节钞》、《语对》、《簠金》、《兔园策府》、《类林》、《事林》、《新集文词九经抄》、《应机抄》、《勤读书抄》等。<sup>②</sup> 敦煌类书的重现展示了魏晋至唐宋间，也就是印刷术未发达之前抄本时代的类书流传情况，那时，类书已经在敦煌这个边远的小城里面流传，成为敦煌学郎的教材；虽然藏经洞只有一个，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散布在中国大地上千百个像敦煌一样的城镇必定也是类书流传的广阔天地。

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立国之前就创制了西夏文，西夏文创制之初就开始翻译《孝经》、《尔雅》等典籍。1909年，沙俄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掘出大量文献，而这其中就有类书，且是西夏文类书，如《类林》、《经史杂抄》等。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先生合著《类林研究》即是以西夏文《类林》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对西夏文做了全面的夏汉对译。<sup>③</sup> 《类林》本是唐朝于立政所编纂的一部小类书，汉文原本早已失传，虽然敦煌文献中亦有《类林》残卷发现，但是残存内容较少，而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西夏文《类林》则较为完整，通过史金波等学者的汉译，我们见到了较为完整的《类林》复原本，也认识了《类林》的流传情况。西夏政权积极吸收汉文化，多次向北宋求书，不断将儒家经典、佛经等文献翻译为西夏文，而《类林》等类书也被西夏人翻译出来，这无疑展现了类书的受欢迎程度，且《类林》等类书的翻译必是在西夏的都城兴庆府完成的，而黑水城却在西北边境，这无疑又展现了类书在西夏政权内部的流传。

中国类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且每个时代都有特色，都有新发展、新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书主要是类事类书，类书与文学、史学关系密切，但类书编纂模式相对简单；唐宋时代，类书的编纂模式多样化，从单纯的类事类书发展到事文并举，并随着科举的发展，数量大增，可谓大行于天下；明清时代，日用类书成为一个潮流，在中下层知识人之间流传，如老黄历一般渐渐成为农牧商贾的生活指南。<sup>④</sup> 类书影响之深远，流

① 酒井忠夫《中国日用类书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2011年。

② 王三庆《敦煌类书》，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149页。

③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 刘全波《论类书的目录学演变》，《图书情报工作》2011年第23期，第122-125页。

传之广泛，也往往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博闻如白居易、秦观，皆编纂类书以备时需，边远如敦煌、黑水城，亦皆有类书流传。此外，类书与古人之间的关系亦是十分密切的，在古人的世界里，类书离他们很近，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疏远，类书拥有众多的编纂者、使用者、阅读者、收藏者，且不断的被刊刻、续编、新编、补编。

## 二、类书在日本的流传

隋唐时代，日本多次派遣使团来中国，而这些遣隋唐使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就是购求书籍，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各种类书；日本现存古籍中就有不少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古类书，打开任何一本汉籍目录，几乎都能看到类书的身影，甚至，不少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类书在日本重新被发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了已经流传到日本的类书“《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类苑》、《类文》、《艺文类聚》、《翰苑》、《初学记》、《玉府新书》、《玉苑丽文》、《玉苑》、《编珠录》。”<sup>①</sup>《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记载的类书《隋书·经籍志》亦多有记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散佚严重，往往不得而见，但部分古籍在日本的重现，着实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

《珣玉集》就是一部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类书，而在日本却有古抄本发现。<sup>②</sup>《经籍访古志》卷5《类书类》载“《珣玉集》零本二卷（旧钞卷子本，尾张真福寺藏）。原十五卷见存十二、十四两卷，每卷首题《珣玉集》卷第几，次行列书篇目，界长七寸一分，幅六分弱，十四卷末记云用纸一十六张，天平十九年岁在丁亥三月写，文字遒劲，似唐初人笔迹，真罕见之宝笈也。但此书未详撰人名氏，其目仅见《现在书目》及《通志艺文略》，知其佚已久，所引各书如《蔡琰别传》、《语林》、《史记》、《晋钞》、王智深《宋书》、《帝王世纪》，近多不传，亦得籍此以存其梗概，虽断简残篇，岂可不贵重哉。”<sup>③</sup>按天平十九年为唐玄宗之天宝六载（747），可知《珣玉集》早在唐玄宗时期已经流传到了日本。此外如《玉烛宝典》、《文馆词林》、《白氏六贴事类集》、《事类赋》等在日本皆有古抄本、古刻本被发现。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绝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更多表现在借鉴、模仿与改造，日本古代文人在引进中国类书的同时，很早就开始了日本类书的编纂。天长八年也就是唐文宗太和五年（831），日本淳和天皇（824－833在位）敕令东宫学士滋野贞主及诸儒哀辑古今文书编纂成汉文类书《秘府略》，共一千卷。目前仅存卷八百六十四（百谷

① 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第52－54页。

② 影旧钞卷子本《珣玉集》，《古逸丛书》，1884年；《珣玉集》，东京：古典保存会，1933年；柳瀬喜代志、矢作武《珣玉集注释》，东京：汲古书院，1985年。

③ 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目录（8）》，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第74页。

部中)与卷八百六十八(布帛部三)。<sup>①</sup>《文德实录》卷四文德天皇(851-858在位)仁寿二年(852)二月条载“乙巳,参议正四位下行宫内卿兼相摸守滋野朝臣贞主卒。贞主者,右京人也。曾祖父大学头兼博士正五位下犹原东人,该通九经,号为名儒。……父尾张守从五位上家译,延历年中(782-805)赐姓滋野宿祢。贞主身长六尺二寸,雅有度量,涯岸甚高。大同二年(807)奉文章生试及第。……天长八年(831),敕与诸儒撰集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凡有一千卷,名《秘府略》。”<sup>②</sup>《秘府略》是日本古代极为重要的典籍,其编纂早于《太平御览》一百多年,是日本古人汉学水平高深兴盛的表现,更表现了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借鉴与超越。唐代开国以来,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皆编纂过大型类书,即《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瑶山玉彩》、《三教珠英》等,走向全盛的唐王朝四夷来服,日本亦多次派遣遣唐使,遣唐使带回了大量的典籍,其中必然有类书,回国之后的遣唐使,处处以唐王朝为样板,类书编纂必然也是如此,于是《秘府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编纂成书。日本古代学者用汉文编纂的类书还有《幼学指南抄》、《香字抄》、《拾芥抄》、《缩芥抄》、《金榜集》、《玉函抄》、《金句集》等。<sup>③</sup>

古代日本学者为了使用中国传来的古类书,就在上面做训读、注解、补充,并将之雕版印刷,于是形成了大量“和刻本类书”。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收录了从唐至清的类书21种,如《岁华纪丽》、《书叙指南》、《事林广记》、《事物纪原》、《小学紺珠》、《书言故事大全》、《群书拾唾》、《古今类书纂要》、《唐诗金粉》、《词林合璧》、《锦字笺》等。<sup>④</sup>“和刻本类书”之中,最有名、影响最深远的是《三才图会》,《三才图会》本是明人王圻编纂的一部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八《类书类存目二》载“是书汇辑诸书图谱,共为一编。凡天文四卷,地理十六卷,人物十四卷,时令四卷,宫室四卷,器用十二卷,身体七卷,衣服三卷,人事十卷,仪制八卷,珍宝二卷,文史四卷,鸟兽六卷,草木十二卷,采摭浩博,亦有足资考核者。”<sup>⑤</sup>《三才图会》之所以在日本流传广泛、影响巨大,是因其流传到日本之后,被日本学者寺岛良安进行了训读、增补、改造,且改名为《倭汉三才图会》。藤原信笃《倭汉三才图会略序》载“浪速医士法桥寺岛良安,卫生家者流也,寄心文学,励业仁术,追慕其迹,倣依其样,举示其部,分聚其类,欲正习俗之误,以助多识之功,聊有所加,亦有所略也,顷岁作倭汉三才图会略,凡百五卷,托物以附意,随言以切事,阙疑而传其信,斥似而采其真,考索之劳思辨之志,可以嘉奖焉。”<sup>⑥</sup>

① 《秘府略卷八百六十四》,东京:古典保存会,1929年 《秘府略(卷八百六十八附卷八百六十四)》,《尊经阁善本影印集成(13)》,东京:八木书店,1997年。

② 《文德实录》,《国史大系六国史》,东京:经济杂志社,1913年,第544页。

③ 《类书》,《大东急纪念文库善本丛刊(12、13)》,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

④ 长泽规矩也《和刻本类书集成》,东京:汲古书院,1976-1977年。

⑤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1160-1170页。

⑥ 寺岛良安《倭汉三才图会》,东京:东京美术,1975年第四版,第8-9页。

日本学者一般将流传在日本的中国古籍称为“汉籍”，而日本古代学者用汉文编纂的典籍则被称为“准汉籍”，其中，中国典籍的日本刻本又被称之为“和刻本汉籍”。纵观日本所存类书文献，既有从中国流传来的“汉籍”，又有日本学者编纂、抄写、刊刻的“准汉籍”、“和刻本汉籍”。为了更加清晰地地区分它们，我们也可以将之分为“汉籍类书”、“准汉籍类书”、“和刻本类书”；“汉籍类书”就是《珞玉集》、《玉烛宝典》、《文馆词林》等，“准汉籍类书”就是《秘府略》、《香字抄》、《拾芥抄》等，而“和刻本类书”则是《三才图会》、《事林广记》等。或许这个分类有不尽完美之处，但凡此种，较为细致的展现了类书在日本的流传接受情况。

### 三、类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

朝鲜半岛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直接相连，故其与中国的交往更是紧密。《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子部下《类书类》收录了目前韩国各大图书收藏机构如高丽大学、庆尚大学、奎章阁、成均馆大学、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所藏中国古类书的情况，从唐宋至明清的中国古类书触目可见，其中亦不乏精本、善本，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白孔六帖》、《册府元龟》、《事文类聚》、《事类赋》、《翰苑新书》、《三才图会》、《唐类函》、《图书编》、《山堂肆考》、《百家类纂》、《图书集成》、《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广事类赋》、《格致镜原》等等。<sup>①</sup>

《内阁访书录》是朝鲜时代正祖时期（1777-1800）的一本目录书，张伯伟先生认为其最初是一个导购书目，随着图书的购入续写了提要，成为藏书目录，并且由于本目录原为购书目录，这对于了解朝鲜时代的文化就更加有意义，它不仅反映出朝鲜王室求书的兴趣，也能看出当时的购书导向。<sup>②</sup>《内阁访书录》载有类书多种，如“《事物纪原》十卷。《广博物志》五十卷。《事物初略》三十四卷。《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五卷。《翰苑新书》前集七十卷，后集二十六卷，又六卷，续集四十二卷，别集十二卷。《事物纪原》四十一卷。”<sup>③</sup>《内阁访书录》所记载的这些类书虽然都是宋以来的类书，但是这些类书的编纂质量是相对比较高的，且其关注中国诸类书的“后集”、“续集”、“别集”，则更可以看出朝鲜古代学者对中国类书的熟悉与了解。

《洪氏读书录》是朝鲜时代洪奭周（1774-1842）为其弟弟洪宪仲编纂的读书目录，洪氏家族是朝鲜时代的名门大族，洪奭周为了指导其弟读书，编成此目录。其子部说家之下有类书二种，一为《艺文类聚》，一为《三才图会》。《洪氏读书录》载：

① 全寅初《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4）》，首尔：学古房，2005年，第649-747页。

② 《内阁访书录》，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1）》，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9-451页。

③ 《内阁访书录》，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1）》，第535-554页。

“《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之所辑也。类书自梁刘峻始，其书今不传，传于今者惟是书最古，古人之遗文佚书尚可赖是而考见焉。夫类书之于问学，末也，如王应麟《玉海》，祝穆《事文类聚》，章俊卿《山堂考索》及康熙时所纂《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皆近世所盛行，以之为应举之用则可，语道则非，所闻也是，以咸阙焉。”<sup>①</sup> 洪奭周言《玉海》、《事文类聚》、《山堂考索》、《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皆是近世所盛行，可见类书在朝鲜的流传。《洪氏读书录》又载：“《三才图会》一百卷，皇明王圻之所作也。……然古之君子左图右书，后世知书而不知图，若此书者，亦近世之所罕有也。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若此书者，其犹足以观古人之象欤。”<sup>②</sup> 虽然洪奭周对于类书的定位不是很高，认为其是“末学”，但是洪奭周无疑还是肯定了类书的知识传播作用，既可以“观古人之象”，又可以作为“应举之用”。

朝鲜古代学者文人在购买、学习中国古类书的同时，也开始了朝鲜类书的编纂。《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记载了古代朝鲜文人编纂的类书，其子部“类书”载有：“《简牍精要抄》、《经史集说》、《经书类抄》、《考事新书》、《考事撮要》、《万象丛玉》、《星湖先生僊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类苑丛宝》、《杂同散异》、《篆海心境》、《竹侨便览》、《芝峰类说》等。”<sup>③</sup>

《芝峰类说》是李睟光（1563-1628）编纂的一部极具特色的类书，共二十卷，有天文、时令、灾异、地理、诸国、君道、兵政、官职、儒道、经书、文字、文章、人物、性行、身形、语言、人事、杂事、技艺、外通、宫室、服用、食物、卉木、禽虫二十五部，其中文章部内容最多，经书部次之。纵观《芝峰类说》之部类、内容，与中国类书编纂大体无二，亦是纠集群书，辑录故事，所不同者，引书之内容更多的体现朝鲜特色，再就是李睟光在部分事类之下，加有按语。《芝峰类说自序》载“余以款启劣识，何敢妄拟于述作之林，略记一二，以备遗忘，寔余志也，若事涉神怪者，一切不录，而于古人诗文，间或参以臆见，则固知僭越之甚，然非敢以己意为是，惟具眼者择焉。万历四十二年七月中浣李睟光书。”<sup>④</sup> 中国类书编纂的基本准则是“述而不作”，而李睟光在编纂类书的时候却有“间或参以臆见”的现象，即在类书中加入了自己的点评、按语、考证，或许是因为李睟光编纂类书的初衷并非是有志于著述，只是自己的读书摘抄，以备遗忘之用，所以难免会加入自己的观点，但这也正是朝鲜类书的一个特别之处。

#### 四、类书在越南的流传

同日本和朝鲜一样，越南曾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但是较之日、韩等国，它拥有

① 《洪氏读书录》，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8）》，第4305页。

② 《洪氏读书录》，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8）》，第4306页。

③ 《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汉城：东亚文化研究所，1965年，第549-554页。

④ 李睟光《芝峰类说》，《朝鲜群书大系统（21）》，东京：朝鲜古书刊行会，1915年，第1页。

最长久的使用汉字的历史，从古代越南铭文和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来看，公元以前，汉篆字即在越南出现；历史记载亦表明，早在赵佗称王及汉武帝置南越九郡，设太守、刺史治理之时，诗书教化已伴随汉文字传入南国。古代越南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一支，一直都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越南的科举制度一直实行到1919年才被废止，故越南是一个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度；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拉丁化的越南语文才取代了越南人日常生活中的汉字与喃字。越南完好保存了大量汉文古籍，据统计其数量不下七千余种。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共收录越南古籍文献5027笔，其中汉文4232种，喃文795种，其中子部类书共19种，汉文书16种，中国重抄重印本3种。它们是《天南余暇集》、《村学指径》、《芸台类语》、《典林撷秀》、《采玉捷录》、《钦定人事金鉴》、《酬奉骈体》、《群芳合录长编》、《摘锦汇编》、《诗学圆机活法大成》、《翰墨名家记》、《学源摘对》、《渊鉴类函略编》、《古事苑》、《源流至论》等。<sup>①</sup>

## 五、交错的文化史

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尊孔氏书，汉字与汉籍的流传塑造了汉字文化圈，类书就是这东亚汉籍中的一支，且数量颇丰；但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诸国，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各自国别的单个种类的类书研究，而对于作为一个既具有文本共性又互有关联的有机体的东亚类书，则缺乏整合性的考察与探究。文化史本身就是一部诸文明交错的历史，我们把类书放在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之中，利用日本、朝鲜乃至越南、琉球留存下来的资料进行研究，也就是从周边看中国，用东亚视角看类书，或许更能看清问题。有人认为类书是剽窃腐烂之书，没有原创性，没有思想性，只是寻章摘句、獭祭餽钉而已，这未免有点无视类书的存在价值了，绵延千百年，流传遍东亚，卷帙数以万计的类书绝对是探究古代知识、文化、学术的宝库；亦有学者认为日本、朝鲜、越南类书与中国类书不具有可比性，其实不然，类书在日本、朝鲜、越南的流传无疑是中国类书在域外的延伸，是中国类书开在异域的花，当然类书在中国与在日本、朝鲜、越南的流传必然有差异，必然各有特殊性，但同异之间，无疑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认清类书的流传、演变等情况。今天，东亚儒学、东亚文学等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东亚类书为何不可一试！

<sup>①</sup>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373-378页。